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 CHINA

# 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

〔德〕狄德满 著

崔华杰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 CHINA

# 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

〔德〕狄德满 著

崔华杰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德]狄德满著;崔华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7034-0

I. ①华… II. ①狄… ②崔…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华北地区—19世纪 IV. 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8854 号

---

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 Chin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 by R. G. Tiedemann

This book is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 R. G. Tiedeman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1-228

---

书 名 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著 者 [德]狄德满

责任编辑 王保顶

装帧设计 陈 翌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16.125 插页 2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034-0

定 价 42.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 序言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狄德满教授专著《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宗教传播与社会冲突》一书终于译成中文文本，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出版了，这是西方学者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又一重要成果。本书原为英文稿，1991年就已撰成，但当时并未立即出版。翌年他来山东大学访问，送一份打印稿给我，计分11章。他曾将其中一两章浓缩为论文出席两届义和团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收入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和《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书中。他的学术功底深厚，其研究以分析缜密见称，行文谨严，言之有据，每一论点均蕴含有极大容量，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均期望其书稿能早日付梓以飨读者。2001年6月，我接受他的邀请同刘天路教授共赴英伦参加由布里斯托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三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曾再次促他将大著出版，他表示将再增补一些文献资料。由于他有繁重的教研任务，这一迟延转瞬又历经了10年时光。现在所译的这本书稿，除前言、结语外，基本上是20年前的成品。其所

征引史料之丰富,如天主教圣言会、耶稣会藏档,传教士传记、著述和通讯,有关各代牧区修会、教士与教廷及其同所在国政府间之往来信函、汇编等等,是他著所难与之比拟的。译者对此已有专文《材料:狄德满义和团研究的亮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7日第2版)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作者在本书副标题中,已指明所述主要史事均属“义和团运动前夕”。这是有其自己见解的,认为1899年夏秋神拳(义和拳)经平原战斗后才是义和团运动形成的标志。其实,义和团运动之酝酿、爆发,无论从其时空与组织等各方面,因难以划一,所以均可视为起源无疑。循此轨迹,我认为本书之显著特色有如下几点。

### (一) 对起源区域之选择与考察

对义和团运动研究首要弄清其起源,而对起源之探讨又重在对其区域之选择与考察。义和团运动不同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事件,自其酝酿或爆发之日起,就以极其神秘特征出现,令人无法窥其真相,这曾极大地困扰了研究者,成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最大难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山东大学历史系就秉承中国史学会指示要攻克这个难关,组织了大规模田野调查队伍,分赴直、鲁、苏、皖等地展开地毯式普查,终于取得了成果。由我执笔撰成《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报(历史版)》1960年第2期)长文,论定义和团运动乃酝酿、爆发于甲午战后的山东、直隶下属几个主要地区:(1)以曹(县)单(县)为中心的鲁西南和鲁苏皖交界的一大片地带;(2)以冠县梨园屯为核心的鲁西北和直隶东南、南部的边缘地区;(3)以东昌府茌平为中心的鲁西地区;(4)以直隶景州为中心的直隶东南地区。这一调查研究成果为史学界普遍接受。1978年美国周锡瑞教授为研究义和团访问山东大学,后于1987年撰成《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专著,该书也接受了这一区域结构的框

架(见该书中译本作者“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著将我前述的山东三个地区综合为:鲁西南的大刀会提供了组织和仪式典型,鲁西北冠县出现了义和拳名号,以与茌平、平原之鲁西神拳仪式相结合,“标志着义和拳运动之构成至此已臻完备”。这一说法几乎成为定见,但在其后出版的日本佐藤公彦教授专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就表示过,若仅以前述三个地区立论,衡之于历史实际似还不够全面。

狄著对此重要问题也表示了己见,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源于山东及其临省边缘地区,应包括:(1)从鲁西北临清往东发展至直隶沧州;(2)鲁南郯城、兰山及与之毗连的苏北邳州、宿迁;(3)鲁西南及其相邻的皖北、苏北、豫东地带;还有(4)鲁东的日照、诸城、莒州与沂水等。这是结合圣言会山东代牧区与法国耶稣会江南代牧区徐州教区之民教矛盾斗争而得出的。我认为这一说法比我和周氏所论的要更全面些。他指出前三个区域之矛盾斗争,主要表现为刀会、拳会之反教骚动;而后者鲁东地区则表现为既有“反教”又有“排外”,这是由地方士绅、团练发动的。对其“排外”,作者引用传教士的报告提到有一个叫“黑会”的组织起着重要作用,并根据中外文献资料论证该“黑会”当属于团练或联庄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他指出该地区之“排外”斗争,实与本籍在职京官煽诱有关;分析了因德国强索采矿权而使当地士绅失去这一资源,遂导致地方反教会斗争同反矿权侵占之客观结合;还揭示了这一斗争是如何在莒州籍京官管廷鹗、廷献和诸城县赫绅臧济臣、俞臣等影响下而展开。他们或通过上奏,或发布反教揭帖,或致函唆使本籍亲戚等传媒手段予以策动。我认为这些分析是有说服力的。我从狄著中还特别关注到:当时像《万国公报》、《山东时报》、《华北汇报》等有影响的报刊,不仅迅速流传于全国发达的通讯网中,而且也能在穷乡僻壤的鲁中、鲁西北乡间看到。2009年德国爱尔福特大学曾举行一次“义和团战争及其传媒——1900年至今对一个跨民族历史事件的塑造”国际学术讨论会,择传媒为

视角推进义和团研究。我认为这是极有意义的探索。

## (二) 对社会结构的分析

本书以微观见长,首在它对各类“社群”之分析。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爆发起来,乃是有其内源性的,即表现在它有历史性暴力的社会基础;而传教所引起的矛盾斗争则是其外在因素,进而结合此内外因素剖析乡村社会结构在基督宗教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动?在“导言”中,更指明本书是要以教士传教、农民反抗、义和团运动起源和华北帝国主义侵袭等作为考察重点贯串于全书中。对圣言会、耶稣会之传教及其支持下的“教民”社群,都有所详析而分见于诸章目。对于农民反抗,则是联系其活动区域之地理环境、组织类型、地方社会关系等,对诸多复杂而又无序的暴力进行辨析。对于“盗匪”更有详细论述,区别了鲁西南与苏北盗匪之不同形态,说明这一特殊社群是如何成为区域社会之有机组成,又是怎样制约了大刀会之对外扩展,同时论证了大刀会之反教骚动何以只能处于地方性竞争和反应性暴力的主要原因。

“秘密教门”是另一极具影响的社群,本书亦有专章论述。作者的视角不是分析它同义和团的关系,而是转向它对基督宗教之皈依。征引了西班牙方济各会教士报告,揭示对社会有威胁性的白莲教,实可分有文武场的组织;还依据耶稣会传教士在《通信年鉴》上的描述,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异端”信仰在直隶东南部吴桥、东光、宁津等县约80万总人口中有一半多信奉了白莲教,在直鲁豫三省也有1/3人口与教门有联系,而在神拳活动的中心地——茌平更有90%是白莲教信徒。据我的研究,这些所谓的白莲教实都是民间秘密教门之代称。若把它扩大到同义和团、基督教三者之间关系去考察,将会有创新性分析,并可说明处在变动中的社会结构,其不同社群之间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基本是既分离又可融合。当然从基督教会这一方说,它对中国社会结构只能是起破坏、



瓦解的作用,本书对此亦有倾向性的论述。

### (三) 传教士及其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辨析

全书对这一方面论述最详尽亦最具有意义,分为两章述析。从多角度探索在义和团运动前夕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是如何在华北这个充满暴力地区展开其传教事业的。作者尤其重点考察传教事业同占有地方资源之间的关系,这是本书之很重要创新处,如对皖北砀山湍地和苏北沛县湖田之争,是驱使鲁西南大刀会入境进行反教斗争的直接导火索。这一地区的水利资源之争,实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之黄河改道,造成原黄河所经之砀山、丰、沛等县都留有許多未有明确归属的湍地。砀山的刘堤头就因一块滩地归属而导致了庞、刘两个族姓的纷争,因刘姓皈依天主教受到教会保护而获胜。本书还特别引述了在该地区传教的艾赉沃神父的自述,指出艾赉沃原不拟介入这一纠纷,终因考虑教民利益而陷入族姓之资源争夺中,后来刘姓又趁庞姓族长死亡之机袭击了庞家林。由此导致了地方官从知县、知府、道台以至总督都转变了态度,共同谴责教会并要教士交出刘姓凶手。这是在中方《教务教案档》中未有的记载,这一揭示极有助于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滥觞于鲁西南大刀会这一支反教斗争之性质有正确认识。不仅如此,本书对这一地带因争夺资源所激起的暴力对抗,作出简明的归结:认为在这一边缘地带看起来无处不在的派系斗争中,“只因传教士的介入和教案发生,才使我们能对这场械斗作一管窥”,“基督宗教就是在这样与竞争性暴力抗争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在山东地区得到发展”。

传教扩张与帝国主义暴力是否有所关联,这是义和团研究著述都要论及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周著中已有很明确的论述,指出天主教会及其西方传教士乃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帝国主义者。狄著对这一说法有所保留,认为圣言会在山东传教,其初乃是

超越国度而服从于罗马教廷的,只是到了德国政府有谋占胶州湾意图后,才与之有密切联系。但狄氏也充分利用教会相关资料,详细地论述了传教扩张是怎样与军事侵略相结合;不仅如此,还对帝国主义及其侵华方式描述多元化,区分为宗教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世俗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帝国主义,指的是德国对鲁东矿路权之攫取;“世俗帝国主义”,则是指德国政府之对华政治侵略;而宗教帝国主义,则是通过基督宗教之精神征服以与帝国政权之武装占领配合。作者进而归结为正是由于世俗帝国主义同宗教帝国主义之相互纠集,才促使了1898—1899年“排外”主义的兴起。这也就说明了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具有反帝性质的根本所在。

#### (四) 对赵天吉及其大刀会活动的钩探

本书虽将鲁苏皖地区大刀会的反教斗争视为基本未超越地区传统的竞争性暴力活动,但也不完全如此,这从作者对另一有影响的游方大刀会及其领袖赵天吉活动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本书对此亦穷尽资料搜寻,认定大刀会之在碭山的反教斗争及其后在巨野磨盘张庄所发生的教案,都同赵天吉活动有关。作者把山东省从黄河以北之寿张、阳谷、观城、朝城,南下经汶上、嘉祥、巨野,再转而与江苏沛县湖田、苏皖北边缘相连,都视为赵天吉的活动区域,认为这个赵天吉就是曹单大刀会首刘士端的师傅赵金环。其论证虽还不能尽如人意,但其对史迹之钩探无疑可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不仅如此,对活跃于鲁苏皖三省边缘地带更具悠久历史的“红拳会”,也予以相当篇幅的论述,指出这支组织也曾一度取代大刀会而居于反教斗争的主导地位;又引艾赉沃神父记载,认定在1898—1899年苏西北、皖北大刀会已改名为红拳会,当时活跃于鲁西南济宁、嘉祥地区的拳会就是由从苏皖北越境而来的这一支红拳会所领导。

以上仅是简略述及狄著的几个亮点,作为“序言”我不宜有过多评述。总之,我认为本书的最主要贡献在于:它对活动于鲁苏皖豫交界地区的大刀会(金钟罩)反教斗争钩沉出许多史事,有助于研究者对它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对于义和团运动起源或酝酿的探索,我还想多说几句话:在我所撰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还只是对于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梅花拳)斗争活动有较为完整的考察;在前引的周锡瑞、佐藤公彦所著二书中,除义和拳外对鲁西南大刀会反教也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评析;而狄著对这一区域的探索,我认为无疑是最详尽而又有所重要发展,足以称为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的又一重要代表作。

当然,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探索,我们也不能认为至此已臻完备。据我历经长期的田野调查,深感沿着直隶白沟河水域地带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区域。它一方面东延并经大清河发展至天津成为这一地区的义和团之来源,而另一方面则北延从新城经定兴、涑水、涿州、黄村汇聚成北京义和团之主力,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当有待于来者。

## 译者的话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狄先生从1974年着手博士论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至1980年代初才完成这项前期工程。此后，由于主要精力要应对教学事务，到1991年才最终完稿并提交给伦敦大学。在决定中译后，狄先生在学术史综述中融入了中外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逐章修改并同步发送与我翻译，2010年7月底英文稿最后一章及附录修改完毕，2010年8月底译稿初稿完成，2011年年初修订稿完成并交付出版社。如狄德满先生在导论中所言，该著汇集了“大量相当分散的档案和罕见的印刷资料”，在此，译者有必要对其中的翻译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2008年底，经陶飞亚先生联系，狄德满先生欣然允我译介这部著作。该著是狄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狄先生从1974年着手博士论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至1980年代初才完成这项前期工程。此后，由于主要精力要应对教学事务，到1991年才最终完稿并提交给伦敦大学。在决定中译后，狄先生在学术史综述中融入了中外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逐章修改并同步发送与我翻译，2010年7月底英文稿最后一章及附录修改完毕，2010年8月底译稿初稿完成，2011年年初修订稿完成并交付出版社。如狄德满先生在导论中所言，该著汇集了“大量相当分散的档案和罕见的印刷资料”，在此，译者有必要对其中的翻译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1) 译著引用的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名称，取自其执照名；部分驻华外交人员名录，采译自《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引用的海外学者的名称，则采用国内学者较为普遍使用的中文称谓。其中确有无无法查考者，采用直译方式，并在中译名后加录英文名。

(2) 原著引用的外文著述，达四百余种，除已有汉文译介且已出版者外，一般为自译，特别是涉及到德文、意大利文、法文等非英语系语言材

料,在引文首次出现时后附原文,以备查考,这样给读者诸君的阅读和资料索引提供尽量的双重方便。此外,在附录的参考文献中,翻译了著者名称、著述标题及出版地。其中,对于地名相对生疏的出版地,前加国别;由于涉及出版社较多,出于读者原文查找方便考虑,不作译介处理。

(3) 著者引用的中文文献,译者尽力查阅并复核;对于转引的中文文献,确有查询不得者,采用直译方式,尚祈读者见谅。

(4) 原著引用的期刊名称,特别是天主教会期刊,其名称采用直译或意译的方式,并附录对应外文名。

(5) 文中插入地图所涉及的地名,根据地方文献资料查找译介,江苏人民出版社据草样输入并编辑,在此特别鸣谢。

这部译著能够完稿,首先感谢译者的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陶先生放手让我负责这项工程,其中的信任和鼓励让我珍怀至今;此外,先生还担任全文的校对工作,译著的每处文字都浸润了他的修改心血。著者狄德满先生逐一核对并校正非英语语言材料的中文译本,从中折射出的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使我受益良多。山东师范大学郭大松教授对译稿初稿的导论和结语两章节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美国佩斯大学李榭熙教授对译稿初稿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建议。在此,译者对以上学界前辈谨表谢意,诸位先生所作的点点滴滴,学生永怀在心。此外,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黄薇女士和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徐锦华先生为译著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提供了最大方便;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刘永祥博士为本著第六章引用的一则《国闻报》材料,提供了索引、抄录原文的帮助。对此盛情一并鸣谢。

这部译稿能够达到出版标准,译者要特别感谢在中国义和团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研究的著名学者、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路遥先生,先生逐字逐句阅读译著的初稿和修订稿,给予了细致的指导,并对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在每次电话沟通时,先生的谆谆教诲是译者能够最终完成这

本译著的动力。没有路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译者无法完成这项当初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务;没有路先生的扶正和定性,译者所作的工作恐怕泯灭了原著应有的学术价值。

这部译稿能够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没有以下诸位先生的帮助断无可能:北京大学出版社岳秀坤先生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初读此稿,并转呈给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先生,后经丛书项目负责人王保顶先生的精心审读、修订和编辑。平心而论,我与以上诸位先生或一面之缘或素未谋面,正是他们高度的学术精神和负责态度,这本书才最终得以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在此,译者深表谢意!

限于译者本身学识有限,译著定有诸多不圆满之处,恳请学界先进给予批评、指正。

崔华杰 2011 年 4 月

上海大学

## 序言及致谢

本书是笔者于199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868—1900年间华北乡村动乱：以鲁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Rolf Gerhard Tiedemann, “Rural Unrest in North China 1868—190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for South Shandong”)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此后,在中国基督宗教史和义和团运动起源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使用单因解释论的已有成果,被使用更为复杂的研究手段和概念工具且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所取代。以下著述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K. J. 里温纽斯(Karl Josef Rivinius)的《世俗势力的庇护与传教工作的进行:德国对天主教鲁南传教的保护》(*Weltlicher Schutz und Mission. Das deutsche Protektorat über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von Süd-Shantung*);柯文(Paul A. 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从周锡瑞和柯文的著述被译为中文,也可看出这些新近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更要给予感谢的是2000年义和团运动

100周年之际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文集也已出版。<sup>①</sup>

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它的反教暴力虽有诸多成果,但主要局限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观中。对基督宗教事业那种天然的、思想上先入为主的解释虽已淡化,但学者们仍继续沉浸于关注外在因素方面。日趋增强的民族主义信念和对理论方法的过度依赖,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上述趋势。换言之,这仍然有足够的空间,使我们把更多的学术关怀放在19世纪下半叶华北平原各色的内源性因素上。在中国日趋恶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基督宗教不仅打着各种幌子进入中国,并被传道地的一部分民众接受。本书把焦点放在对高度复杂性地方环境相当细微的描述上,探索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传教地皈依者是如何在华北平原这个根深蒂固充斥着暴力文化的地区开展工作的,而该地在义和团运动前夕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加深的历史背景。

在这份研究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笔者应对以下诸位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的是论文导师柯文南(Charles A. Curwen)博士,在我几年茫然不知所措的阴晦时光里,他用温馨且持续的鼓励帮助我坚持论文的写作。已故圣言会的约翰内斯·贝特雷(Johannes Bettray, 1919—1980)神甫允我遍阅坐落在德国波恩附近圣奥古斯丁的斯泰尔宣教会(Steyl Missiological Institute)所储藏的大量资料,而这正值关键的研究初期阶段。我的朋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鲍德威(David D. Buck)教授数年来也给予我诸多的帮助、鼓励和建议。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罗伯特·麦科尔(Robert McColl)教授在制图方面给予了慷慨帮助。自博士论文完成后,笔者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著名专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的大作中汲取了新的见解。在本人数次逗留济南时,刘天路

① 苏位智、刘天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时也出版了以下著述:苏位智、刘天路:《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路遥:《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和陶飞亚两位教授给予了大量的鼓励和帮助。对于以上诸位,我深表谢意。

该研究是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诸多地方开展的,我要给本研究提供帮助的档案馆和图书表示由衷的感谢。笔者还应当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在我论文写作期间,外交署政治档案存储在波恩,后转移到柏林)。要特别感谢位于前东德波茨坦的中央档案馆给予查询前德国驻华使馆档案所给予的方便,该档案现藏于柏林里特希菲尔德的联邦档案馆。其他重要的档案收藏地在参考书目也已列出。还有许多给予至关重要帮助的图书馆,下列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耶鲁大学的斯特林图书馆(Sterling Library)、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安多佛-哈佛神学院图书馆(Andover-Harvard Theological Library)、纽约的宣道研究图书馆(the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现在隶属于协和神学院的伯克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毕巴蒂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以及现已解散原位于波恩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图书馆(Jesuit Library of Katholische Missionen)。

在此,当然要特别感谢上海大学博士候选人崔华杰先生所作出的忠实翻译工作。美国佩斯大学李榭熙教授(Joseph Tse-Hei Lee, Pace University)在中文版本定稿前,通读全文并做了一些重要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狄德满

2011年于伦敦